

郭沫若 作品经典

第十八册 文论 杂文(2)



中国华侨出版社

GUO MORUO ZUO PIN JING DIAN

郭沫若作品经典

第十八册

文论·杂文(2)

中国华侨出版社

写在菜油灯下

考虑到在历史上的地位，和那简练、有力、极尽了曲折变化之能事的文体，我感觉着鲁迅有点象“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但鲁迅的革命精神，他对于民族的贡献和今后的影响，似乎是过之而无不及。

鲁迅生长在民族最苦厄的时代，他吐出了民族在受着极端压抑下的沉痛的呼声。内在的重重陈腐，外来的不断侵袭，毫不留情地压抑着我们，有时几乎快要使我们窒息。但我们就在那样的态度之下，顷刻也不曾停止过反抗的呼声。这呼声象在千岩万壑中冲进着的流泉，蜿蜒，洄沔，激荡，停蓄，有时在深处潜行，有时忽然暴怒成银河倒泻的瀑布。

这呼声，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通被录音下来了，便在鲁迅的全部著述里面。

民族的境遇根本不平，代表民族呼声的文字自然不能求其平畅。

民族的境遇根本暗淡，反映民族生活的文字自然不能求其鲜丽。

汪洋万顷的感觉，惠风和畅的感觉，在鲁迅的文字中罕有。这与其说是鲁迅的性格使然，宁是时代的性格使然。

许多对于鲁迅的恶评：“褊狭”，“偏私”，“刻薄”，“世故”……事实上，都是有意无意的诬蔑。

我不曾和鲁迅见过面，他的生活、性情、思想，不曾有过直接的接触。——这在我是莫大的遗憾。

但以鲁迅的学识、经验、名望，假如他真是“世故”，或多少“世故”得一点，他决不会那样疾恶如仇，尽力以他的标枪匕首向社会恶魔投掷。

假如要代表社会恶魔来说话，那鲁迅诚不免是“褊狭”，“偏私”，“刻薄”。这在鲁迅正是光荣。

我曾经对于骂鲁迅的人，替鲁迅说过这样的几句话：

“同一样是骂人，而鲁迅之所以受青年爱戴者，是因为他所骂的对象，既成的社会恶魔，为无染的青年所未具有。鲁迅之骂是出于爱，他是爱后一代人，怕他们沾染了积习，故不惜呕尽心血，替青年们作指路的工夫，说这儿有条蛇，那儿有只虎，这儿有个坑，那儿有个坎，然而也并不是叫他们一味回避，而是鼓励他们把那蛇虎驱掉，把那坎陷填平。”

这几句话，我不敢说果能道着鲁迅的心事，但在我是毫无溢美、毫无阿好的直感。

鲁迅在时，使一部分人“有所恃而不恐”，使另一部分人“有所惮而不为”的，现在鲁迅已经离开我们四年了。

蛇虎呢？依然出没。坎陷呢？依然纵横。

剩给我们的是：加紧驱逐和填平的工作。

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

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

1940年6月^①

① 最初发表时，文末自注为“十月十二日夜”。

青年哟，人类的春天！

“五四”运动的历史到现在竟有了二十二周年了。这个有光辉的纪念日——五月四号，被定为了“青年节”，这意义是很值得阐发的。青年是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就是进步的象征。人类社会乃至一切自然界的进化关键，可以说就操持在青年的手里。宇宙中举凡运行的轨迹都呈抛物线形，近来已由物理学家证明，连太阳光线从前以为是直线进行的，其实也是采取曲线的行径。年有春夏秋冬，人有幼少壮老，都同样是抛物线形的轨迹。假使没有明年的春夏，万类便只好永远的死亡，假使没有第二代的青年，人类的一切便只好永远的衰歇。青年哟，人类的春天！就靠着有这青春的一季，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进行到抛物线的顶端；也就靠着有这不断的青春的来复，使我们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精神发展，永远保持着上行的阶段。前一代的抛物线的顶端成为后一代抛物线的起点。向上的波澜，一波未平，一波继起，就这样使必趋没落的抛物线变为永远进展的无穷曲线。自然及人类是这样进化了来，也将这样进化去。所争者只是在：无意义的运行或有意识的策动。人类也经过了很长远的无意识时代，这时代快要成为过去了。对于运行轨迹的研究愈透辟，策动运行的意识便愈清醒。我们把“五四”定为

青年节的意义，也就是这种意识觉醒的明白表示了。我们希望：“五四”运动时所表现的那种磅礴的青年精神要永远保持下去，而今后无数代的青年都要保持着五四运动的朝气向前跃进。继承“五四”，推进“五四”，超过“五四”。使青年永远文化化，使文化永远青年化。

文化的本质其实即可以定义为“人为的进化”。它是对于自然界的一种斗争，对于凡是不利于进化的自然界的暴力及其惰力。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在它本身也具有自然的暴力和惰力，当它能征服暴力和惰力（连它自己本身在内）的时候，它是自然界的主人，文化的创造者。当它驯服于暴力与惰力之下而听其支配的时候，它是自然界的奴隶，文化的阉割者或破坏者。暴力的行使者和身受者，虽然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同样是为暴力所支配的奴隶。不能克服他人的暴力而俯首帖耳，固然没有担当创造文化的资格，不能克服本身的暴力而趾高气扬，结果也只是破坏既成文化而堕入兽域。“五四”运动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反对人类社会的最大暴力，另一方面反对封建制度，这是反对中国本身的最大惰力。运动的精神和文化的本质合拍，故尔“五四”运动成为文化运动的纪念碑，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民族经这一运动而青年化了。“五四”以来的二十二年间的进展，毫不夸张地，可以说抵得上“五四”以前的二千二百年间的进展。我们不要为泥古的习惯所囿，应该把眼光看着前头。二千二百年来的文化积蓄，固然有它精粹的成分存在，值得我们研究、阐发、保存、光大，但从那年代的久远和适用价值的有限上来看，我们的进步实在是十分迂缓，这不仅中国是这样，凡是文化意识觉醒以前的近代各民族，毫无例外地，都是这样。到了现代，空前的距离有了无限的缩短，时间的范畴

得到无限的扩充；人力的效率增大到了无穷倍。这是事实，也可以说是人力造成的奇迹。我们虽然还未走到近代文化的最高峰，但自“五四”以来，我们是不息的在向上走着。这路是荆棘的路，但同时也是争取荣冠的路。我们要发挥我们文化民族的使命，便不得不斗争。没有斗争便没有文化。目前的世界有极端疯狂的暴力正在向着文化摧残，向着创造文化的精神摧残，把人类拖到黑暗的悲惨的死灭地狱。我们要从这世界末日中把文化救起，把创造文化的精神救起，救起自己本身，救起全民族，救起全人类。

救民族，救人类，并不是空洞的夸言壮语，也希望不只是空洞的夸言壮语。要做，也是容易的事体，在每个人的份内，就请从自己做起吧。在目前大动荡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不愿意堕入那死灭地狱的。但要从那种结局中把自己救起来，须得彻底反抗那种摧残文化的暴力，同时并须克服自己内心的苟且偷安、甘为顺奴的那种惰性。所以目前要救自己，便须得人人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战士。目前的时代，或许会被人认为变例，其实无论处在任何时代，人人都须得自救。克服自己的暴力不以妄施于人，克服自己的惰力不甘受别人的横暴，这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义务，同时也是对于社会的义务。所谓“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正是这种精神。有这种精神，才可以救济自己，更进而救济民族，救济人类。无论平时和乱时，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所最难克服而且也最当克服的便是驯服于老衰现象的惰力吧。每一个人把青壮年时期一过，肉体的大部分官能便翻过抛物线的顶点而走向老衰的下坡路。这是每一个人所难免的自然惰力，几乎是绝对地不能克服的。但也非真正绝对地不能克服。在这儿精神

的力量是可以克服肉体的衰残。这并不是神秘的唯心论，而是可以找出科学的根据的。便是人体的各种细胞组织中，发展的历程并不一致，凡是官能低级的组织，如筋肉系统，便发展快而早衰，官能高级的组织，如神经系统，却发展徐而后谢。伟大的人便能以后谢的精神力量统御早衰的肉体官能，决不向老衰屈服。古今中外有不少的伟大人物，他们直到老年都还能保存着他们的活动能力，那秘密就在这儿。一句话揭穿，便是古人所说的“老当益壮”。孟子有句话说得好：“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句话如要免得被人专向消极方面去解释，似乎竟可以改说为“大人者不失其青年精神者也”。伟大人物便是永远的青年，他们不仅把老衰现象克复了，甚至连死亡现象都可以克复。他们的著书、传记、坟墓，都在发生着作用，真真是所谓“精神不死”。

老年人都须得青年化，青年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世间上青年化的老人很少，而老人化的青年却偏偏多。就在我们自己的眼前，就已经有不少的青年是未老先衰了。这原因，一部分固由于青年自己的不努力，不自爱，或自暴自弃，而一大部分是由于老年人的管教错误。文化意识未觉醒的老年人不仅自己不思振作，反而倚老卖老，以老人的气习、生活、思想、行动来绳范青年；青年人在这种管束之下，有的不自觉地便驯致颓唐，有的却反拨地趋于堕落，就这样便断送了无数的青年。一个人老当益壮的精神强，那人必然伟大；一个人未老先衰的气象十足，那人必然腐败。一个民族，老当益壮的人多，那个民族也一定强；一个民族，未老先衰的人多，那个民族也一定弱。我们中国在前是大可以称为老人国的，积弱的原因一部分也就存在这儿。古时候我们中国的教育，差不多是把青年当成罪人

在看待的。所谓“扑作教刑”，把这个观念表示得非常明白。“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死的打活的，老的打小的，打出了做老爷的来呢，做老爷的又打做老百姓的，做老百姓的又打做老大老二的。万般皆是打，老气满中华。好多年辰以来，中国人实在老衰得不堪了。你叫中国民族怎么能够强，中国文化怎么能够有进步呢？“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分水岭，便是把老气的支配推翻了一大部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不是逐渐振作起来了吗？

我们且看那可以成为建筑材料的树木，只要那树木的种子是落在土壤肥沃的原野里，它能得到充分的阳光、空气、水分、养料，它在自然发育的状态中，必然成为参天的大木，极有用的建筑器材。人要加以管理，只要注意到阳光、空气、水分、养料的供给，或者为它排除昆虫或其他外来灾害，那树木的发育自然可以得到帮助而被促进。管理，只是助成，并不是拘束。例如把那同样的树苗，拿来种在庭园或花盆里，自幼加以无理的剪削、拳屈、束缚，使它成为一定的型，那树木便不能遂其自然的成长而成为畸形的物什。这些畸形的物什在某种意义上或者可以中观瞻，但不中实用。一旦畸形一被形成，即使加以解放，放还自然，也不能恢复它原有的树性。它是在无理的管束之下已经僵老了。教育的意义和这林木的培植，应该没有两样。我们对于青年应该充分地给以营养资料，不时地对于外来灾害加以防护，让其自然发展，那他一定是可以成为大器的。青年的精神便是向上的精神，没有本来就不自爱而自甘堕落的青年，除非是精神病患者。真正可以作为青年导师的，认真说只有那永远不老的伟大的人。古人也有“人师”和“经师”的区别，所谓“经师易遇，人师难逢”。经师是供给材料的技术家，人师是

指导精神的领港者。职司教育的人，连易遇的技术家的责任都未能尽职，却往往爱以难逢的精神领港者自居，一般的青年能够被培植为盆栽小景，都要算是侥幸的了。孔夫子在中国的历史上终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他是负责的教育技术家，而同时又能“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是称职的精神领港者。他诚然有一个人格的规矩尺度，但他不必一定要把这种规矩尺度来绳范人，他说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能取狂狷，正是深切地了解青年气质的人。记得罗素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主张，是说青年的性质就骄傲一点也无妨事。青年的性质偏于进取，在老成者视之，自不免近于狂。青年的心地洁白无染，有好些俗套的行为在所不屑，在世故者视之，自不免近于狷。狂与狷能够见容于孔子，这大约是现代的教育家所应该取法的吧。视青年为罪人的时代，在中国应该是老早过去了，青年自己也应该以民族的主人、文化的创造者，自尊自重。

1941年5月3日

蒲剑·龙船·鲤帜

端午节相传是纪念屈原的日子，据说屈原是在这一天跳进汨罗江里自杀了，后人哀悼他，便普遍地举行种种的仪式来对他作纪念。这传说是很有诗意的。不过在古时在有些地方也有把这个日子认为是纪念伍员^①的。例如曹娥的父亲便是以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死。大约伍员的死期也是五月五日（《左传》鲁哀公十一年所载吴杀伍员与鲁伐齐事，正在五月）。但后来却为屈原所独占了。

抗战以来，因为国家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唤起了人们的注意，端午节的意义因而也更被重视了。特别在今年，有好些做诗的人竟把这个节日定名为“诗人节”。所纪念的本是诗人，纪念的仪式又富有诗意，定名“诗人节”，似乎比“天中”、“地腊”、“端阳”、“重午”……这样的旧名称要来得新鲜一点。但我希望这个民族的大众纪念节日，不要被解释为少数的“诗人”所垄断，那就好了。

端午节这个日期的确是富有诗意，觉得比中秋节更是可爱。前人有把诗与文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类的，象征地说来，可比端

^① 即伍子胥（？—前484），春秋时楚国人。

午为阳刚的诗，中秋为阴柔的诗吧。拿楚国的两个诗人来说，屈原便合乎阳刚，宋玉便近乎阴柔。把端午定为屈原的死日，说不定会是民族的诗的直觉，对于他的一个正确的批判。

古时候曾经把这一天当为邪辟的日子，大概就是因为是伍员与屈原的死日，两人同是被一些邪辟小人所迫害而死了的，由民族的正义感竟把这个日子当为了忌日。这一天认为是百邪群鬼聚会的日期，连这天生下的儿女都认为不祥，不让他存活。例如孟尝君是五月五日生的，他的父亲决意丢掉他，是他的母亲私下把他养活了。汉朝的宰相王凤也是五月五日生的，他的父亲也想不要他，是他的叔父以孟尝君的故事为例又才保存了下来。由这些故事看来，在古时为忌避端午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儿女。这固然是当得铲除的恶习，但推其原故，实由于仇视邪辟。在古时是认为邪辟的力量太大了，几乎为人所不能敌。但由这同一的观念所生出的良风美俗，却是对于邪辟的斗争。

群鬼百邪害死了忠良，损伤了民族的正义感，故尔每一个人为自卫和卫人计，都须得齐心一意的来除去邪鬼。先除去自己身心的邪辟吧，要以兰汤为浴，以菖蒲泛酒（俗间在酒中对以雄黄），不仅要保持身体的清洁，还要争取内心的芬芳。更进而除去一切宇宙中的邪辟吧，以蒲为剑，以艾为犬（古时曾以艾为人或虎），岂不是象征着要民族的每一个人都成为驱魔的猎人，伏虎的斗士？这诗意真真是十分葱茏，值得我们把它阐扬、保存、而且扩充——扩充为民族的日常生活：熏茝不同器，邪正不两立！

划龙船的风俗是同样值得保存而加以发扬的。这和欧美人的竞漕 (boat race) 具有同样的国民保健的意义。在这健身的意义之外，尤可夸示的，是它本来所含有的培养民族精神的作用。

龙船竞渡相传是为拯救沉溺了的屈原，但实质上便是拯救被沉溺了的正义！正义被邪辟陷没了，我们要同一切的邪辟斗争，即使是在狂涛恶浪当中，我们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一定要把那正义救起。这是含有何等崇高意义的精神教育！这个是屈原精神和诗歌的形象化，以这来纪念屈原，我觉得是民族的共感所洗练出的最好的诗的方法。可惜这意义，多少是失传了，仪饰仅存着化石的形式。现代的诗人们不是应该吹入自己的生命，使化石复活吗？

端午节的风俗也传播到日本去了，蒲剑兰汤，形式上差不多没有两样。龙船虽然没有，但有“鲤帜”（Koinobori）的变异出现。在五月间，日本的乡村农家差不多每一家的空场里都要竖立一根旗杆，在上面挂着一个或一个以上由小而大的布制鲤鱼。鱼有红黑两种，小者数尺，大者丈余，肚腹都是空的，一有风，便为气流所贯，在空中飘荡起来，俨如鱼在游泳。日本人以五月为男童节（以三月为女儿节），一家有多少男童便挂多少鲤鱼。这用意不用说是中国的鲤鱼跳龙门的演化，但用以为端午的一种仪饰，在中国不知道有没有它的母家。或者也怕是出于误会的转变吧。鲤鱼所跳的龙门是河津的龙门，而楚国别有江渚的龙门，即楚国的东门，所谓“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便是这南方的龙门了。因为南方也有龙门，故尔用鲤鱼来表示追慕的象征吧？不过纪念屈原的意义，在日本是完全失传了的。“鲤帜”，在日本人，是认为努力争取功名利禄的表现。争取功利之极则不惜牺牲他人以肥自己，这是日本人的活生生的国民教育。

鲤鱼究竟还未化成龙啦。要使日本民众知道端午节的意义是在整饬自己乃至牺牲自己以拯救正义，在东亚才能有和平出

现的一天。但是，龙，说不定也可以退化而为鲤，或者确实的僵化而为石。那更是我们所不希望的。敢于改端午节为“诗人节”的诗人们，多多努力吧！

1941年5月27日

屈原的思想

侯外庐先生的《屈原思想的秘密》，认为屈原的思想有矛盾，而“这一秘密是归结到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的矛盾”，这个断案是相当正确的。但他把屈原来和一九二七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对比，又和法国的巴尔扎克与俄国的托尔斯泰对比，这儿便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是近代欧洲文学的写实主义的巨匠，他们在方法论上是进步的，然而一则拥护王权，一则笃信宗教，在 worldview 上是偏于保守。这个矛盾，在现在已经成为了周知的事实，不成问题。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合乎科学的规律，他也确实是得到了空前的收获。而他却自命为胜清的准遗老，终于跳水以殉，博得一个“忠愍”的谥号。这却明白地表示着他的思想的落后。他的死，正是这种矛盾的一种消极的解答，也是毫无问题的。但要说屈原的死也和这是一样，方法论是前进的，“求真的”，世界观是落后的，“本质上反动的”，那却不免大有问题。我的看法，却正相反。屈原的世界观是前进的、革命的，而他的方法——作为诗人在构思与遣词上的技术——却不免有些保守的倾向。这便是我所认识的屈原

• 本篇后并入《屈原研究》，为该文的第三节。

思想的矛盾。结论的形式虽然和侯先生所见到的相同，而内容则恰恰相反。如要展开这个问题，在步骤上却非把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发展，重新展开一遍不可。

中国的古代，在殷以前大抵是氏族社会——我说是大抵，因为对于这一个时代我们只是出于推测，并没有充分的实证。殷周时代确实是奴隶社会——我说是确实，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得到的确证很多，是不会成为问题的。虽然现在也还有人在说周朝是“大封建时期”，或者又有人在说“中国没有奴隶制度”，或“奴隶制度未完成即已蜕变”，但这些说法，我觉得，都是由于认识不足，研究还没有到家。假使大家再充分地搜集些材料，把认识充足起来，我相信在不几年之内是会改变的，只要是真正地抱着历史唯物主义，而没有成见的人。

为什么说殷周是奴隶社会？因为当时是在用大规模的奴隶来从事生产。关于生产奴隶的有无这一点，近来也还是有人认为尚未论定。我们做学问，每每不从本质上用功夫。譬如说“封建”吧，首先就把那一套“封诸侯、建同姓”的旧观念在那儿盘旋。古时是说夏、殷、周三代为封建期，现在让一点价，把夏、殷赶出去，把周代保留起来，即作为“封诸侯、建同姓”的“大封建时期”。我们就不问，究竟我们现在所说的封建制的本质是怎样，周朝的生产方式又是怎样。又譬如说“奴隶”吧，便只在奴隶字面的文字上去找奴隶社会，把《说文解字》乃至《康熙字典》翻遍，所能找到的臣妾童奚奴婢以至隶仆台舆等等，找来找去都只是一些从事服御的家内奴隶。做了这一段功夫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是只有家内奴隶，没有生产奴隶，所以他们会说中国没有奴隶制或奴隶制未完成便起了蜕变。然而他们却没有想到中国古代的生产奴隶并没有用臣妾奴婢隶仆台舆等字